

 全球化论丛IV

全球化与 新制度主义

薛晓源
陈家刚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全球化论丛Ⅳ

全球化与 新制度主义

薛晓源 陈家刚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主 编 / 薛晓源 陈家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 任 部 门 / 编辑中心
(010)65232637
责 任 编 辑 / 宋培军 周 岩
责 任 校 对 / 咏 湖
责 任 印 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 者 服 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 律 顾 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6.25
字 数 / 383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190 - 318 - 8/D · 091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全球化主题书系总序

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球化对世界历史进程和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深刻，这些年来国内和国际发生的各种重要事件，几乎没有一件不与全球化相关。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作为国际社会的积极成员，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回应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已经成为我国政治家和学者共同的课题。加入 WTO，意味着我国在更深的程度上参与全球化进程，这不仅要求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全球化的进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而且也要求我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讨论，在诸如全球化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上，能够更多地听到中国学者的洪亮声音。

对全球化的系统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开始，90 年代以后达到了高潮。现在，“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简直成了生活中最流行、最时髦的话语之一，有关全球化的各种观点也陆续产生，它们试图从各种视角对全球化的概念、特征、内容、表现、后果及对策等做出系统的研究，从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全

球化理论。到目前为止，全球化研究至少呈现出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全球化研究的跨国性。全球化研究始于西方发达国家，但现在，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都成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全球化是一项真正的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或者说是一种真正的超国理论（supernational theory）。其次，全球化理论的综合性。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但是归根结蒂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发展过程。无论人们愿意与否，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展开，文化、艺术、伦理、学术和政治的全球化过程也或多或少开始出现了。与此相适应，全球化理论具有很大的综合性，至少包括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等基本内容。再次，全球化理论的包容性。全球化理论是各种政治倾向和学术倾向的一个交汇点，它不同于其他带有某种单一政治或学术倾向的理论，如新左派或新右派理论、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社群主义理论，更不用说自由主义理论、保守主义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在全球化理论中我们可以听到具有上述各种政治或学术倾向的学者的声音。最后，全球化理论的内在矛盾性。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相应地，在全球化研究中，充满着各种对立的观点。有人把全球化当作福音，有人则认为它是灾难；有人把它视为人类的出路，有人则将它看作是我们的陷阱；等等，不一而足。从全球化研究的这些特征中可以看出，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多学科、多国别的研究领域。在 21 世纪的相当长时期内，它将一直是各国社会科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谢寿光社长及其领导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精心推演主

题出版新理念，雄心勃勃，力图成为发表国内外全球化研究最新成果的主要出版社，成为展示各种全球化理论观点的重要平台，在近些年集中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全球化的论著和译著，其中包括《全球化译丛》、《全球化论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等，并协办、联合主办了一系列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如“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2000年，北京）、“全球化与21世纪国际论坛”（2001，河北）、“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国际论坛”（2001，武汉）等，先后邀请了萨米尔·阿明、多斯桑托斯、大卫·赫尔德等数十位全球化问题国际知名学者来华访问、讲演，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学术界对全球化的研究。作为这一全球化主题系列书系的一个编者，我衷心地希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能够在广大读者、作者和译者朋友的共同支持下，不断地推出优秀的研究成果，使书系越出越好。

俞可平

2003年6月9日

全球化时代：我们何为（本辑序）

薛晓源

一 全球化：我们所在世界的知识语境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通信技术和因特网日新月异的发展，全球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联系和交往在日甚一日地加强。全球化现象于是凸现，全球化成为最时髦的词语，在全世界主流媒体和大多数人的嘴边流动。

随着全球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快速渗透，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也呈现出来，从达沃斯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到意大利的西方八国财长会议，抗议和流血事件不断增多，反对全球化的声浪不断增大增高。

有识之士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究竟怎么了？在近10年一浪高过一浪的全球化浪潮中，西方的学术界对全球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反思，出版了2000多种著作和30000多篇文章。其中，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频繁亮相的知名政治家，如德国原总理施密特撰写的《全球化与道

德重建》和德国原财政部长、原社会民主党主席拉封丹撰写的《不要恐惧全球化》等，他们从亲身的经历出发，详细考究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管人们是欢呼还是咒骂全球化，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全球化就在人们身边，逐渐成为不争的事实。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全球化已经成为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知识语境，是当代知识分子认识、关心、介入现实的新工具。美国杜克大学副教授哈尔特最新撰写的《帝国》一书，从比较历史学、比较政治学、比较文学的融合视野出发，勾勒了从古希腊到现在全球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样态：帝国的扩张、形式的变迁和兴衰，在西方引起强烈的反响。西方媒体普遍认为，《帝国》一书的出版激活了人文学者对当代社会的现实关照和介入，为人文学者的存在价值赢得尊严。关于全球化问题，当前国外理论界主要有三种看法：①激进的全球化主张。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日本著名观察家和评论家大前研一和英国社会学家阿尔·布劳，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全球经济的崛起、全球治理机构的出现以及文化在全球的扩散和交融都被视为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的证明”（《全球大变革·导论》，第6页）。②温和的全球化主张。戴维·赫尔德称之为变革论者，他认为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贝克，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当代模式是前所未有的，全球的国家和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过程，要努力适应这个相互联系更加紧密、但是非常不确定的世界。③怀疑论者的批评。以赫斯特、汤普森为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神话，掩盖了国际经济不断分裂为三个主要地区集团、国家政府依然强大的现实。不管他们争论的焦点究竟是什么，但是他们的话语言说已经不可回避地成为我们对全球化研究和言说的知识语境。

二 全球化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把握决定我们究竟以什么方法和视角去研究全球化问题。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领袖”、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先生认为：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流动的现代性，在这里，流动指的是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的跨空间和时间的运动。全球化就是时空压缩，全球化使得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即时互动的社会；西班牙籍美国社会学教授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指出：“在全球经济里，全球能够变成一个单位而以即时或者在选定的时间里运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是不断扩张，总是尝试克服时空的限制，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末，以信息与通信科技提供的新基础设施为根基，以及在政府和国际机构所执行的解除管制与专业化政策的协助下，世界经济才真正变为全球性的。”德国教育部副部长格尔茨对全球化的过程和本质体认尤深，他认为全球化使这个社会成为突然加速的社会。

三 全球化时代，我们何为

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总是喜欢吟咏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著名诗句：在这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我们是否也需要躬身反思：身逢信息爆炸、知识快速嬗变的全球化时代，作为知识界的代表——知识分子应该何为？我个人认为应该清醒地认识和把握我们所处的时代，既不惊慌失措，也不隐逸回避；应该直面我们时代所遭遇的挑战，厘清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痛苦；按照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不同学科的分析、综合和研究。这就是我们组织编译这些学术前沿报告的宗旨和目的，

也是我们试图回应“全球化时代，我们何为”的一种尝试。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和我们知识范围所限，我们这里编选的文章只是粗略代表当代国际学术前沿的主要流派，面对浩瀚和激变的国际学术瀚海，可以说是挂一漏万，不足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广大作者、译者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2002年10月于北京新风寓所

前言：全球化时代的新制度主义

陈家刚

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在反思经济学中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发现”了制度分析对解释现实问题的地位和作用。科斯、德姆塞茨的产权理论，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以及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最终在经济学研究中形成了新制度主义研究系谱。马奇和奥尔森发表的《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揭开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序幕。

新制度主义的复兴并非制度分析的一种简单回归，而是制度分析的现代转型，是制度分析的演进。随着 20 世纪后期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表现出更多的形式，其丰富的内涵也充分地展现出来。通过描述新制度主义的起源、基本的理论内容、知识基础以及分析范围的拓展，我们就能够更深刻地认识新制度主义，并客观地对它做出全面评价。

一 新制度主义的起源

20 世纪 70、80 年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在反思经济学中的

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发现”了制度分析在解释现实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形成了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

制度一直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受科学主义思潮和反理性思潮的影响，传统政治学开始向现代政治学转变。行为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的主流理论。制度被排除在主流政治学研究视野之外。

从本质上讲，行为主义政治学是对传统政治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革新。在研究对象上，行为主义以政治行为和行为互动代替传统的政策和制度；在研究方法上，行为主义借助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量化和实证分析。行为主义认为，个体的真正偏好只有通过一定的行为才能具体地表现出来；集体现象是个体行为的聚集，个人的偏好只有通过利益聚集机制才能带来最佳的效果。但是，行为主义的研究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味地强调价值中立和研究手段的科学化，使政治科学远离了现实政治生活；而从现实来看，主流学者无法应用行为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世界复杂的变化，他们对 60、70 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和越南战争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无能为力。这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理论家的反思和批判。1984 年，马奇和奥尔森发表了《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他们指出，由于行为主义的影响，作为政治生活基本因素的组织被忽略了，而实际上，组织和法律制度则是政治生活的主导者。个体“表现出来的”偏好与真正的偏好是存在距离的，集体决策不是个体偏好聚集的结果，而是决策规则影响的产物，而且集体决策无法还原为个体偏好。他们提出用“新制度主义”观点来看待政治生活，重新复兴制度分析的作用。

在政治学领域中，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与对行为主义理论的

批判是分不开的。新制度主义者认为放弃对制度的研究是行为主义的一个主要缺陷。“新制度主义强烈反对把行为确定为政治分析的基础要素；他们不相信行为能够为解释‘所有政府现象’提供足够的基础。因为，行为发生在制度环境中，因此，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必须考虑制度因素。”^①

而在经济学领域中，主导二战后西方国家经济实践的主流思潮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它们使西方国家经历了战后长时期的经济繁荣。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经济停滞，失业问题困扰着各国的决策者。这种状况引起了人们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反思，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宏观问题，政府作用、政府职能问题等进入了经济学领域。在这样背景下，一批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深入研究制度、制度变迁及后果、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并得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例如加尔布雷斯的“制度演进”、诺斯的“制度变迁”和科斯的“产权理论”等。从经济学视角对制度进行研究，开拓了经济学的研究新视野，经济学领域的新制度主义研究逐渐兴起了。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自建立之日起，就与社会制度的研究和制度变革的比较分析密切相关。社会学者一直认为制度影响着社会和经济行为。然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力图解释制度而不是简单地假定制度存在。正如维克多·尼所说：“事实上，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代表了现代实证社会学的主流。这一遗产是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所寻找的基础。”^② 社会学中的新制度

① Ellen M Immergut,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 Society*, Stoneham; Volume 26, Mar, 1998.

② Mary C. Brinton and Victor Nee e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主义研究路向可能被认为是社会学向新古典主义的转向。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扩展了古典主义社会学者和早期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学者的知识遗产，后者同样与经济学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知识交流。

二 新制度主义的知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已经变成超越单一学科，遍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分析路径。豪尔和泰勒认为，在政治科学中就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新制度主义，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①美国学者彼特斯也概括出了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各种流派：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②这些不同学科、不同流派的制度研究共同建构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体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规范制度主义。

1. 社会学制度主义

社会学制度主义倾向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而且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块。这种界定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倾向于将文化本身也界定为制度。

^① Peter A. Hall,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1996), XLIV, pp.936~957.

^② B.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Wellington House, 1999.

社会学制度主义解释的重点是为什么组织采取一套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符号，这些又是如何在组织内传播的。即：

①“组织的生态，以及把组织的生物生态模式结合在一起。”环境为组织生存提供机会并维持许多结构，如公共部门的地位可能是预算资源、法律命令、制度的政治支持和群众的政治支持形构的。

②对组织符号和价值向度的关注超越了组织的纯功利性视角。组织符号成为认识制度行为的最佳手段。“制度是一种意义系统，制度内的组织行为及个体行为依赖于意义的注入和符号的运用。”

③人类生活的当前实践是建立在过去基础之上的，组织实践下面隐藏着历史遗留下的价值和理解力，反映了“制度的历史和积累性本质。这些结构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是，它们也保留了过去历史的特征。”

④社会学制度主义是用制度透视组织，制度和组织实际上是同一个结构。^①

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影响行为的方式是通过提供行为所必不可少的认知模版、范畴和模式，影响个体的基本偏好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个体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某种“实践理性”的基础之上，个体或组织寻求以一种具有社会适应性的方式来界定并表达他们的身份。

2. 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制度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政治结果的多元动因。历史制度主义是“历史的”，历史是克服人类理性局限性的一个主要途径；同时又是“制度的”，它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

① B.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Wellington House, 1999.

历史制度主义力图寻求对不同国家的差异性政治后果做出更好的解释。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政治结果的差异源自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和政治变量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例如 70 年代石油危机期间各国的政策差异以及欧洲各国医疗保健政策的差异等主要是由于一套政治制度的、政策制定机构的联结方式。^① 某种政治结果的出现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存在着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制度因素是推动历史沿着某一路径发展的相对稳定和最为核心的因素之一。“历史制度主义虽然关心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但是很少有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是产生某一政治后果的惟一因素。他们尤其倾向于将制度与其他因素一道定位于因果链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观念的分布状况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②

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强调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即前一阶段的政策选择往往会决定和影响着一阶段的政策方案。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巩固存在着“路径依赖”，历史制度主义致力于在发掘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对人类产生相当影响的政治进程如国家与社会革命、国家建设、民主化等问题时，不仅要找出那些共时性的结构因果关系，而且还要从事件变迁的历时性模式中发掘出因果关系。

3.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这种分析路径起源于对美国国会制度的研究，关注国会的规定如何影响立法者的行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首先坚持把“理性

① Peter J. Katzenstein,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298.

② 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1996), XLVI.

的个人”作为理论分析的起点，其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要对政治现象提供充分的解释，就必须对制度进行分析，因为所有的政治行为都发生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是个人主义的。它以个人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把制度安排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来解释和预测个人行为及其导致的集合结果；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偏好是外生于制度的；个体的行为以计算“回报”为基础；制度的功能在于增进个体的效用，因此，人们通过对制度的重新设计实现制度的变化。

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看来，制度就是某种规则，该规则界定、约束了政治行为者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时采用的策略；遵守制度不是道德、义务使然，而是经过计算被认为符合自身的利益，即“结果性逻辑”；制度是可以设计的，其结果主要取决于所设计制度内含的激励与约束。在个人与制度之间，一方面，制度通过塑造人的行为影响政策结果，制度构成了个人的“策略背景”；另一方面，个人也塑造了制度，制度是基于个人的需要才被创造出来的，即个体通过制度的创新提高收益水平。“考虑到行为者是理性的，因此一旦对制度产生了某种逻辑上的需要，它就会被创造出来。”^①

4. 规范制度主义

规范制度主义认为，人们的行为不是以计算回报为基础，而是以确认“什么是恰当的行为”为基础的，人们的行为是一种规范驱使的行为，即人们的行为遵循“恰当性逻辑”。^② 制度

① James G. March, Johan P.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9.

② James G. March, Johan P.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9.